

# 庆历四年春

□ 徐问笑

庆历六年九月十五，应好友滕子京之请，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，名动天下的《岳阳楼记》，亦因此得以应运而生。数千年以来，治国平天下一直是读书人终生为之奋斗追求的目标，然而第一次，有人以一种直抒胸臆的方式，于天地间发出如此响彻千古之声音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故此文甫一面世，无论当世之人，还是后世之人，少有不为文正公之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而折服、倾倒。

## 曲初奏谐

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”，此文正公开开篇第一句。倘是对宋史，尤其是“庆历新政”有所了解的人，当知道，与“庆历四年春”和“谪守”两词产生联系的又岂止是滕子京一人之命运。

庆历三年，是范仲淹经历半生仕途沉浮后，终掌中枢大权的一年，亦是为庆历新政唱响奏曲的一年。宰相是其视之如父的杜衍，范仲淹任参知政事（副相），任枢密副使的韩琦、富弼二人，则与他志气相投；而欧阳修、蔡襄、王素、余靖这4位谏官，亦皆是知己之交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一时俱全。故素有整顿吏治、加强武装、改善经济之志向的范仲淹，于次年夏天，在宋仁宗责令条陈政事之际，当庭上呈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》，借此提出了“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、推恩信、重命令”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。

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，由此拉开了序幕。

庆历三年秋，新政开始渐次向全国颁布推广。倘无意外，来年的春天，将是新政在全国上下全面开花的大好局面。可以这样说，庆历四年春，这应是一个被范仲淹寄寓了无数美好期待的春天，如同大自然的生机勃勃、繁花似锦，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在经历了数十年苦寒、风雨之考验后，亦似乎终于可以在这一个春天里尽情绽放了。

## 戛然而止

然而，不幸的是，他的这个愿望未及盛开，便以一种凄然、壮然而又

惶然的方式凋零了。甚至有点不堪的意味在里面。

以夏竦为首的政敌们，利用诽谤和构陷之手段，对范仲淹及其政治盟友韩琦、富弼、杜衍、欧阳修等人，就士大夫安身立命最为基本，亦最为重视的两个方面——政治大节和私德品行，报以种种恶意攻击和抹黑。在政治大节方面，他们就“结党”一事大做文章，而范仲淹在面圣自辩时，因自认坦荡，问心无愧，反而就势提出了“君子党”之一说。欧阳修则更猛，他直接撰写了一篇言辞激烈、文理兼具的雄文上呈仁宗皇帝，题目就叫《朋党论》。可惜的是，文章是好文章，殊不知，已然犯了一个天大的忌讳。诚譬如一个医者，任其制药的本领再高，若不擅把脉，所开之药不但不能对症，反倒成为害命之药了。

所以，关键的问题出现了。欧阳修也好，范仲淹也好，这哥俩谁也不曾摸清楚仁宗的“脉”，抑或说，他俩皆不曾真正看透赵宋王朝君主们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治国理念之下，那份根植于骨子里的隐秘防备之心理。

宋之“重文轻武”，乃是太祖立国之初便制定的国策。且终两宋300多年的王朝统治，赵宋的后嗣君主们或许有各种毛病，但他们大多皆能恪守宋太祖遗训。同样是勒石为戒，偏安一隅的南宋君主，在国破旗失后，震慑犹在；而明朝倒好，直接让一个叫王振的大太监将铁碑搬走砸坏了。

然宋太祖自己本是武将出身，却为何如此“重文教，轻武事”呢？概因宋的江山，并非凭着强大的实力打下来的，而是肇始于一个偶然的事件：黄袍加身。这在整个历史上，亦是不多见的。导致这个现象的，恰恰是源于晚唐的藩镇制度。藩镇割据，发展到后期，就是谁的拳头厉害，谁就是老大。诚如后晋将领安重荣所言：“天子，兵强马壮者当为之一！”所以亲信取主上而代之的事件，在短短几十年间，时有发生。五代十国就如一幕幕历史短剧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这里，再无秩序与道义可言，背叛与杀戮取代了忠诚与仁慈，强大的武力

就是规则。

陈桥兵变，亦不过是藩镇制度的一个缩影而已，或者说是一种升级版

的僭越行为罢了。虽然，赵宋王朝亦因此而来，却诚不愿，日后或有人效仿之。

善于总结的宋太祖还发现，强大如唐帝国者，除了藩镇制度使其中央集权失控外，中晚唐之失，亦在于党争为祸甚烈。所以，警惕官员结党，

就是成为宋太祖及其后嗣君主们之共识。

是故，当仁宗皇帝一听到结党之词，这位素有仁爱之名的帝王亦不免敏感起来，再加上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不但不以为忤，反而振振有辞，更使他忌憚不已。即便早先的仁宗，对新政确实抱有极大期待，然在此时，亦不得不有所动摇了。

## 卷入党争

可见，在揣测圣意方面，他们的政敌，显然更加技高一筹。当然，或许在范仲淹这样的磊落君子看来，大丈夫既以天下为公，又何须揣测圣意？然而，在一家一姓之天下的时代，失去圣心，这一仗，亦意味着他们已呈必输之局面了。奸险如夏竦者，为使宋仁宗彻底厌弃范仲淹等人，紧接着又出了一个大招。史载，他令家中使女天天临摹太子中允石介的笔迹，等足可以假乱真时，便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。其中有一段话，最是致命，即劝说富弼效尹霍二人，行废立之举。此伪密信之一出，纵范仲淹与富弼之忠心天地可鉴，文章如何了得，亦是白沙在涅，再无法自辩清白。

至此，两人只能借边事再起，分别于庆历四年的八月、九月，自请出京巡守了。

历朝历代，凡推行新政与改革，纵出于国于民有利，然对既得利益者而言，却是大大不利的，故往往群起而攻之。而范仲淹新政中的“抑侥幸”，其刀锋之所指，就是权贵子弟的荫恩机会。这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

的斗争，没有任何调和之余地。史载，范仲淹为相，锐意改革吏治，取诸路监司名册，将不称职者一笔勾去。枢密使在其侧云：“十二丈则是一笔，焉知一家哭矣！”范仲淹回答说：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！”宋人爱以“丈”称呼尊长，这里的十二，当是指范仲淹在家族同辈中的排序。这里的枢密使，乃是富弼。富弼亦非怕事之人。宋史记载，他多次出使辽国，且每次皆据理力争，坚决不肯割地。由此即可看出，这绝对是一位颇具胆识的人。而他所以在一旁说话，只是让范仲淹有心理准备，这每一笔下去，对所涉及之人及其家族的冲击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击和报复。

而范仲淹的回复，亦正贯彻了他一直以来的凛然之气节：对不称职者的“残酷”，正是为了对更多苍生负责。

然而，面对范仲淹们的“不容情”，夏竦们的反击也来得更加猛烈与恶毒。

庆历五年正月二十八，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，富弼亦于同日被罢去枢密副使。第二天，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，出知苏州。三月初，韩琦亦被罢去枢密副使。

然夏竦犹未罢休。在私德品行上，他则攻击欧阳修与名分上的外甥女张氏（其妹夫前妻之女）有私情，且借欧阳修早年所作的一首词，大做文章。欧阳修百口莫辩，虽事后查无实据，但终究名声有碍。于庆历五年八月，亦黯然离京，去了滁州做太守，其千古名篇《醉翁亭记》亦是作于此期间。

随着范仲淹、杜衍、韩琦、富弼与欧阳修等人一一被逐出朝堂，庆历新政自然也随之“流产”了。

## 热眼旁观

然其影响却是深远的。庆历新政自发起，到以一种狼狽不堪的方式落幕，我相信，有一个人，始终在默默而又冷静地旁观看、思考着。亦正是此人，在范仲淹死后，其在《祭范颍州文》中称范仲淹为“一世之师”，

力量最为集中，亦最为猛烈的，几乎全是来自与王安石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故旧亲朋那里。其中，既有王安石变法的前驱者——昔日“庆历新政”的主将们，如三朝宰相的韩琦、富弼，以及时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；亦有与王安石相交莫逆的好友，如反对派中的司马光、吕公著、韩维三人，还曾与王安石有“嘉祐四友”之称。可以说，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大臣，分明是代表了那个时代最为精英的一个士大夫集体。

范仲淹的“庆历四年春”，以无尽的遗憾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悲凉的一页。他永不会想到，25年后，同样一个春天，同样是参知政事，同样壮怀激烈、忧国忧民，同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，同样是以失败而告终，但个人的结局却又如此不同。范仲淹仅凭“文正”之谥号，则足见其不论生前身后，名声无碍。而王安石，却远没有他的这份幸运。

这是大宋的悲哀，是王安石的悲哀，亦是历史的悲哀。

除了宋神宗的支持，王安石几乎是孤军作战。他破格提拔的一些年轻人，除了让他日后在史书上平添一笔令人诟病的话题外，并未能发挥多少实质性之助力。然而，王安石何许人也，人称“拗相公”的他，又岂会轻言认输，何况，他亦坚信，“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财；取天下之财，以供天下之费”。此当是解决宋朝积贫之唯一出路。故王安石亦是“余心之所向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也”。

王安石如此，司马光等人亦如此。这是由宋神宗一朝所开启的一个独特之政治现象，它打破了中国古代政治向来非黑即白的定律，即朝堂上的对立，正派与反派一定是极为分明的，在宋代中期的朝堂上，谁都代表了正义，谁也都不全然无辜。起初，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认定的“正义”而战，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。然相争到最后，这份“正义”亦失去了最初的味道，逐渐演变成纯粹的新党与旧党之争，这就让人始料未及了。

事实证明，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何其难也。



# 简单的奇案

□ 东 力

1781年（清乾隆四十六年），甘肃冒赈案事发，犹如一颗石子丢进平静的水面，荡起层层涟漪，甚至波及浙江。

## 窝案

甘肃冒赈案是清朝一起重大窝案，持续时间长达六七年，牵涉人员众多。清代在甘肃曾实行过“捐监”，想取得监生资格的人，可按规定数目向官仓捐交谷粮。地方官员在“捐监”上大做文章，将原本防灾减灾的工作变成了中饱私囊的摇钱树，上下勾结、侵吞国库。案发后，督抚大员、道府府县，被正法、赐自尽的官员多达数十人，甘肃官员“为之一空”，震动全国。

此案关键人物、主犯王亶望，原为甘肃布政使，后升任浙江巡抚。案发不久，王亶望既已伏法，并处抄没家产，案件处置延伸到浙江。相对于调查案情，抄没家产任务较为简单，承担这项工作的则是王亶望的顶头上司、时任闽浙总督陈辉祖。然而，这个简单的环节，在陈辉祖的手里又捅出了大窟窿。

## 案中案

1782年（乾隆四十七年）初，查抄清点后的王亶望的家产被运解到京城。虽然此批在册财物计价高达300万两白银，但是乾隆帝亲自检验后，却发现抄没物品大多平淡无奇，“多系不堪入目之物”，这与乾隆帝本人的估计大相径庭。

就在一年前，乾隆帝第五次巡幸江南，实地感受过王亶望的“豪气”，还拒收过他进贡的玉瓶、玉山子等贵

重礼物，然而这些东西都不在册。进一步，将查抄物品的底册与进呈册详细比对后发现，两者相差很大，进呈册比“精华尽失”。问题很清楚：有人顶风作案，调包了！这时，乾隆帝震怒之余，仍然高度信任陈辉祖，“陈辉祖受朕深恩，不肯扶同徇隐”，认为肯定具体经办人员瞒天过海，作出此等利令智昏之事，还指派陈辉祖继续参与事件复查。最终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，这件案中案的主谋就是陈辉祖。

乾隆帝对于陈辉祖的绝对信任是可以理解的。陈辉祖是功勋子弟，其父陈大受德才兼备、素有清名，是乾隆朝前期重臣，尽忠国事，积劳成疾，壮年卒于两广总督任上，谥号“文肃”。陈辉祖是陈家后辈中最为出众者，乾隆帝格外关注，厚爱有加。陈大受去世后，19岁的陈辉祖即以荫生入仕，到户部工作，经过多个重要岗位的锻炼。1766年（乾隆三十一年），年仅34岁的陈辉祖就被委任地方大员，担任安徽按察使。1769年至1779年的10年之间，陈辉祖历任广西、湖北、河南三地巡抚。之后他又担任河东河道总督、江南河道总督，督署两江总督。1781年（乾隆四十六年），陈辉祖被正式任命为闽浙总督，成为真正的封疆大吏。30年仕途，数年一迁，朝廷对陈辉祖寄予厚望，可谓皇恩浩荡。然而，信任一旦失于监督，陈辉祖便犹如脱疆野马。

## 贪官和庸官

甘肃冒赈案好比惊天一雷声，严厉的惩处几乎使甘肃官场“为之一空”，这样的高压态势居然没有警醒陈辉祖，此为一奇。陈辉祖刚刚就任闽浙总督，又被钦点为专案组成员，居然监守自盗，犯下案中案，此为二奇。陈辉祖作案手法简单到甚至不加

掩饰，直来直去，连查抄物品的底册都没有更换，此为三奇。不作死就不会死，自作孽不可活。简单的奇案，教训令人深思。

真相大白后，乾隆帝对陈辉祖依然心存怜悯，“辉祖罪固无可道，然与亶望较，终不同”，处以监候。这样的结果，意味着陈辉祖仍然有一线生机，但是事情的发展一波三折，跌宕起伏。

1783年（乾隆四十八年），陈辉祖原来任所的主要官员，浙江巡抚福崧、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、闽浙总督富勒浑先后上奏，报告陈辉祖在任期间政务武备废弛、仓谷亏空，民情不稳。陈辉祖的问题不仅仅是贪腐，而且尸位素餐，有失担当，守土失责，是典型的贪官加庸官。乾隆帝醒悟，陈辉祖“罪无异亶望”，下旨令其立即自尽。

人死为大，但是余殃未尽。1788年（乾隆五十三年），湖北吏治不堪，追踪溯源，也是陈辉祖担任巡抚时的遗孽，朝廷便将陈辉祖之子流放伊犁戍边。至此，陈辉祖可谓是家破人亡财散。

督抚大员有封疆之寄，备受重托、权重一方，是清朝政务体制中的关键少数。但是信任绝对不能代替监督，如何加强对这些封疆大吏的监督，是治国理政之要。然而，根据学者统计，乾隆朝所发生的31件督抚贪贿案件中，仅仅只有3件是由御史弹劾而进行调查的。这样的结果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监察未能或者难以履职尽责，法纪松弛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乾隆朝之后，清朝日益衰落，局面也就越发不可收拾了。



# 履职尽责的古代循吏

□ 石志刚

吕坤在《呻吟语》中指出：“做官都是苦事，为官原是苦人。官职高一步，责任便大一步，忧勤便增一步。”“虽抱关之吏，也须夜行早起，方为称职。”履职尽责成为官员为官的基础。如果做不到履职尽责，就谈不上做一个好官。

明代名臣丘濬在每一个岗位上，都能够圆满认真地完成各项工作。丘濬在考中进士后，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。他在翰林院任职的时候，充分利用翰林院藏书丰富的条件，“翻阅书

史，口诵心惟”，认真阅读和钻研翰林院所藏典籍。他在自己的槐荫书屋中，以书为伴，手不释卷，废寝忘食。1454年7月，朝廷纂修地理志，才学渊博的丘濬担任地理志的编纂。为了更好地编纂好地理志，他努力搜集全国各地风俗善恶、赋税多少、山川险易、地理远近等各方面资料，认真阅读，悉心领会。经过两年时间，地理志编撰成功，皇帝为该志作序，并赐名《寰宇通志》。鉴于丘濬参编《寰宇通志》，业绩卓越，朝廷授予他正七品翰林院编修一职。

在翰林院工作期间，他非常注意对朱熹学说的系统学习和消化。经过挑灯夜战、苦心耕耘，丘濬完整辑录了朱熹的语录。1463年春，他将朱熹的言论进行编辑整理，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著作《朱子学的》。该书起名为“学的”，是受到了杨时“学以圣人

为的”的影响。《朱子学的》全书分为上下两卷。该书为当时和后世人们全面系统地了解朱熹学说提供了方便。丘濬的志向不仅仅在于从事文章撰写，更在于参与实际政务。在参与政务中实现报国理想，是他更大的追求所在：“既登名仕版，旦暮授官，可以行吾志矣。”1491年10月，丘濬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，入内阁参与机务，由此跻身于权力中枢机构。他工作认真，任劳任怨，多次向明孝宗上疏献策。首先，他将自己多年结合时政的思考进行系统阐释。他向皇帝上疏《公铨选之法》《建都议》《贡赋之常》《漕挽之宜》《漕运之宜》《漕运河道议》《制国用议》《盐法议》《边防议》《赏罚议》《马政议》《山泽之利》等，这些奏议系统论述了政治、经济、民族、军事、教育、民生等方面治政内容，为明孝宗的统治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方略和理论依据。

其次，他能够针对朝政中存在的现实问题，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。当时任用奸佞、贬斥贤良、大肆腐败等现象丛生。丘濬给明孝宗上了一个

折子《论厘革时政奏》，告诫皇帝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从端正自己行为做起，谨慎处理神仙之事，谨慎运用财物而不加重百姓负担，谨慎听取臣民意见而不至于偏听偏信。明孝宗看了这个奏折后批示道：“这本所言，止印经、节赏赐、停织造、杜塞希、求长官等项，皆节中时弊，该衙门看了来说。欽此。”明孝宗对丘濬提出的观点表示认可。

当时国家藏书逐渐损坏和丢失，为了让书籍更好地发挥作用，用于治国理政，丘濬向明孝宗上折子，在折子中申明保护好国家图书资料的重要价值，提出要拷贝重要古籍，搜罗民间经史子集之书，修建藏书楼等建议。明孝宗看了这个折子，非常赞同丘濬的建议，批示翰林院要及时认真执行，使得国家典籍得到应有的保护。

在丘濬等老臣辅佐下，明孝宗执政前期，锐意改革朝政，裁汰冗员，抑制宦官，体恤民情，节省营缮，有效革除了当时朝政的各种积弊，缓解了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，使得明朝出现政治清明、经济发展、社会安定的局面，史称“弘治中兴”。与丘濬同朝为官的刑部尚书何乔新评价丘濬：“公之在位，调需均平，百吏奉法，百度惟贞。”

1495年2月，丘濬溘然长逝，享年75岁。丘濬去世后，明孝宗赐号为“文庄”。在明孝宗御祭丘濬的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丘濬的一生成就：“惟卿早擢高科，历事累朝，博学能文，名闻允昭，简在朕心。”其文章学问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。丘濬事功业绩亦比较突出。凌迪知在《国朝名世类苑》中称赞丘濬为“中兴贤辅”。

